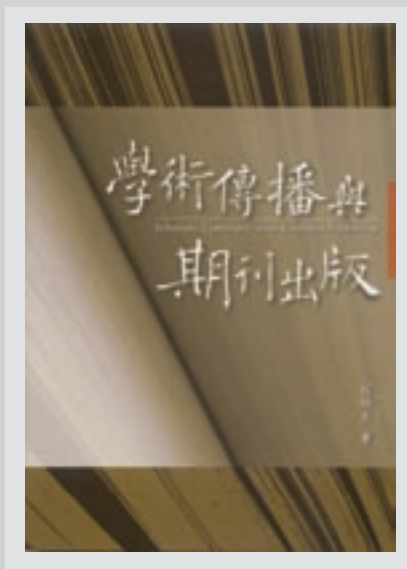


書評： 邱炯友著《學術傳播與期刊出版》

黃元鵬



書名：學術傳播與期刊出版
著者：邱炯友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者：遠流圖書
出版年：2006年5月
頁數：345面
高廣：21公分
價格：新臺幣400元
ISBN：957-32-5786-6（平裝）
語文：中文

閱讀邱炯友著《學術傳播與期刊出版》（以下簡稱《學》），第一件事恐怕是不能被書名誤導，因為本書一共八章，範圍除涵蓋學術傳播與學術出版（第一

關鍵詞 (Keywords)：書評；邱炯友；學術傳播；學術出版；期刊出版；現代性；生態式思考；技術

Book Review；Jeong-yeou Chiu；Scholarly Communication；Scholarly Publishing；Journal Publishing；Modernity；Ecological Thinking；Technology

黃元鵬：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社會系博士生；E-mail: y.huang4@lancaster.ac.uk

章)、期刊出版(第二至四、七章),尚且包括論文引文(第五、六章)及大學出版社(第八章);至少第五、六、八三章讓人覺得該書的書名未免辜負了內容,因為這三章所討論的環節雖相關而事實上已遠超過期刊出版——這是我的解讀(或誤讀)。依作者的說明(頁i),則本書的結構可能必須視為圖書資訊學(第一章)、學術期刊(第二至四章)和學術傳播下的出版議題(第五至八章)等單元。^[1]假使避免淪入買櫝還珠的窘境,姑且忽略書名,我們真正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或許是:如何在現代學術生態中定位本書所涉及的議題?如何詮釋與分析本書的觀點?

以最化約的形式來說,任何傳播活動均包含四個元素:傳播者(sender)、傳播內容(content)、傳播方式(mode)及接收者(receiver),而所傳播之內容為學術研究相關訊息時,即可名之曰學術傳播。研究者對這四個基本元素偏重的情形各不相同,論點遂大異其趣。本文以傳播方式為主要分析線索,尤其著重技術(technology)之介入與作用,和《學》一書相互映對,藉以呈現該書的意義、價值和得失。

一、現代性與學術邏輯

很難用一兩條粗淺的理由解釋現代學術界重視期刊的現象。在學術社群中,流行一條冷硬的法則:「不出版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彷彿將學者的角色定位在學術研究而不甚在意其教學職責與表現。這種情形在英美學界如此,以台灣來說也差不多。學者必須持續出版才能獲得升等,「升等」意味對學術研究者的實質獎勵,隨著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等等名銜而來的,是相對不同的學術權位和利益。如此誘因所在,學者汲汲於迎合、遵守現實遊戲規則的熱忱並不令人驚奇。

現代性(modernity)雖然是個內涵極為繁複的概念,其中一個非常基礎的特

[1] 權且以樹狀結構來說,我的想法是:學術傳播為傳播研究的分支,學術出版則在學術傳播之下;而學術出版可以更下分為學術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可隸屬於此)、期刊出版、圖書出版,乃至包括引文分析等等平行細類。引文分析本不限於期刊出版方面應用,即使在本書論及的兩章中也未例外。我理想中的書名是《期刊與學術出版》或《學術期刊與學術出版》,然而這個見仁見智的落差,除了容易讓本書為粗心大意的讀者錯過,無損於它的貢獻。

質是秩序與控制，源自啓蒙思想發達以及近、現代科技之長足發展。^[2] 簡單說，現代性的秩序與控制特質，其具體表現之一正是種種量化操作程序之設計。一般來說，「科學」被視為現代文明的基石，已是當代社會最具說服力的詞彙，凡是無法被量化的說法，很難被視為「客觀」、「科學」而獲得廣泛認同^[3] 而在評定學者的資格良窳時，爲了要具說服力，偏重研究能力無非因爲它比教學能力易於量化。

以研究成果出版與否丈量研究能力之高低，未必就會走上重視期刊出版之路。這個現象的形成，是雞生蛋、蛋生雞式的因果關係：因爲資訊是實踐（practice）的基礎，而實踐也往往產生新資訊；活躍的學術領域一方面訊息生產能力強，同時對訊息也有較高的「消費」需求。期刊相對於書籍出版，主要差別之一是「新」。前者由於「製程」較短，是提供較新近訊息或知識出版流通的便利工具，於是越活躍的學術領域，就會越重視期刊出版；反之亦然。^[4] 學者既著重期刊出版，研究者遂以期刊爲主要研究資源，合力之下使特定學術環境的生存法則更加穩固且影響深遠，亦相對反映出學術環境的邏輯特色及制約效果，也是《學》開宗明義第一章中學術社群 / 出版 / 期刊 / 市場等等議題得以串聯的關鍵。^[5]

二、學術市場化

學術刊物都很貴，這是學術圈的常識。《學》則分別以期刊出版（第二、三章）、開放存取（Open Access，第七章）及大學出版社（第八章）爲題，涉入學術出版生態的市場化面向討論。

[2] 秩序和控制不是現代性的專利，只是在現代性中地位顯著。有關現代性與秩序、控制的討論，參見 John Law (1994), *Organizing 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有關現代性與科技的討論，參見 Thomas J. Misa, 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2003), eds,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 科學思想固然強調秩序、控制與量化，量化思想並非科學思想的全部。下文將繼續論及無法或不易量化時，學術社群的因應之道。

[4] 據我對國內各校、系升等辦法及教師著作的有限觀察，大勢是理工科比社會學科重視期刊出版，人文類學科又次之。

[5] George Ritzer 以美國社會學界現況爲例，對學術市場有不同觀點的觀察和分析。參見 George Ritzer (1998), *The McDonaldization Thesis: Explorations and Extensions* (London: Sage), Ch. 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y: A Metasociological Analysis', pp. 35-51.

我們幾乎可以說：「錢」是人類最共通的語言，大部分同質或異質的事物均可經由某種程序轉譯（translating）成或高或低的價錢，進而交易；學術研究領域也沒有例外。只要我們繼續應用秩序、控制和量化這幾個簡單的概念，就不難理解學術市場化現象背後的原理，因為市場化的過程正是控制秩序以達到量化之目的，最後則是換算、轉譯為某個價格，以供交易。

在現代性的光照之下，所謂學術、所謂知識生產過程，當然不可自外於現代性可控制的權威。事實上，此一過程也約略遵循某種相近的、固定的秩序進行著；而過程既然容易掌握，下一個實務問題便是：誰來執行這些勞務？不論是誰執行出版勞務，都必須有人支付勞動費用。一份學術出版品的價格，就是計算這個過程中所付出的勞務成本，加上出版單位期待的利潤，從而決定的。學術出版品比其他出版品製程長而銷量低，換句話說，就是成本相對高而利潤空間相對小，以致價格必然居高不下。在《學》的討論中，亦處處可見學術出版中的市場因素之作用。其中的關鍵是：只要最具體可見的勞動力能夠量化，欲量化學術出版品的價值就不是難事了。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量化是秩序和控制的基礎工具。《學》一書同樣給我們不少實例，如期刊退稿率、時間管理等等（第三章），都是藉由量化手段控制「品質」，以轉化為期刊競爭力；而在量化以控制品質的方法中，最關鍵的工具之一是引文。

三、引文的形式意義與象徵功能

在引文這個議題，再一次令人感受到現代性、科學等等思想的影響。科學強調客觀、講究證據。最佳的證據莫非直接獲得的實證資料或數據，但是處處要求第一手實證資料並不符合人力的現實限制，因此間接證據也必須被學術社群認可。然而，這些證據同時必須能禁得起其他學術社群成員覆案，所以應該明確交代來源。這是引文的基本意義，也是學術研究者的常識。然而，若非從現代性秩序與控制的角度思考，無法理解引文格式何以必須統一。

《學》討論了引文格式發展的過程及對學術傳播的影響（第五、六章），除了簡要地涉及引文分析的相關議題，最重要的仍是強調引文在量化期刊、論文品質控制方面的貢獻。這是引文的形式意義。然而，引文其實還具備了另外的象徵功能。

前面曾經提過，量化並非現代性的全部，在量化之外，現代學術社群發展出來的控制方法是引文與同儕評閱雙管齊下（《學》第二、四章）。在引文方面，首先是各個學術社群自有其獨特的書目格式，以此控制該領域知識發展的形式與效率。^[6] 至於引文的象徵功能則意外地與同儕評閱互相牽連。同儕評閱本是學術社群藉以濟學術著作秩序控制無法徹底量化之窮，但是已有學者坦白指出，引用文獻是一種象徵符號^[7] 有時竟是成見橫亘在胸的評閱者用以判定論文高低良窳的依據^[8] 導致作者在投稿不同期刊時，必須針對引用文獻大幅調整，以相對迎合不同評閱者的偏好^[9] 換句話說，同儕評閱和引文相互為用，以賞（錄用）罰（退稿）為餌，成為學術社群控制知識鏈結並壯大社群的手段。這是我們在《學》中相關討論之外，應該特別注意的。

四、技術的角色與影響

《學》很普遍地或簡或繁論及學術期刊與學術出版的諸多議題，到目前為止，希望我已經適當地將這些議題置於相應的脈絡中，賦與知識社會學意義；接下來還必須指出的，則是一個常見的思考盲點，我們不妨稱之為「技術烏托邦觀點」（technological utopian perspective），意指過分單純地將技術視為技術，忽略其社會性，以致對技術所可能發生的影響，其推論若非過度樂觀，就是過度悲觀。^[10]

[6] 以著名的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最新版（X1）為例，它宣稱已經收錄超過 3,000 種以上的格式（style），可見全面統一引文（及書目）格式是遙不可及的幻想。有些期刊甚至連摘要格式、論文寫作形式等細節都有鉅細靡遺的規範，如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大部分期刊即是，可見控制機制之徹底，不容彈性。

[7] Henry G. Small (1978), 'Cited Documents as Concept Symbol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8 (3): 327-340.

[8] 葉啓政（2003），〈台灣社會學的知識 -- 權力遊戲〉，《政大社會學報》，35：1-34。

[9] 蘇國賢（2004），〈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台灣社會學》，8：133-192。

[10] 近年來類似的觀點已經逐漸受到挑戰，例如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 這本期刊經常發表針對電腦科技的社會面向討論的研究。另外在資訊科技方面，如 Janet Low and Steve Woolgar (1993), 'Managing the Social-Technical Divide: Some Aspects of the Discursive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in Paul Quintas, ed., *Social Dimensions of System Engineering: People, Processes, Policies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Hertfordshire: Ellis Horwood), pp. 34-59. 該文亦檢討一般常見技術 / 社會對立分法的不恰當。

如果技術不只是技術，那麼該是什麼？想像我們在薩哈拉沙漠中央設置一台影印機，顯然它只是一具廢物。它需要電源，而為了電源，至少必須有足夠的發電設備。假設我們有了發電機，或許還得準備發電用的汽油或瓦斯，以及不虞斷絕的能源供應系統。即使將條件降至最低，當作這樣已經能提供充足的電力，影印機還不算影印機。再持續推論，我們需要紙張、碳粉，需要清潔、保養器材及人員，也需要防水、防曬設備。只要我們有足夠豐富的想像力，等一切基本條件都描繪完畢，還得再問一個問題：在薩哈拉沙漠中央，需要影印機嗎？可見「需求」也是其中一大關鍵。想想看在極度依賴紙張文件流通的學校環境，會在需求達到何種程度時才能成功說服總務單位多採購一台影印機？

因此，我們可以說，技術不只是技術。以影印機而言，不過是現代社會一項非常普通的技術產品，然而實際上它本身正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生態縮影：在有形方面，必須有足夠的物理條件保證其運作順暢；在無形方面，則其存在並且發揮應有功能，代表環境對它的需求已達相當程度，否則它比裝飾品不如。

以上對影印機實例的說明固然十分簡略，已經足以印證一個事實：對技術的生態式思考，能比技術烏托邦觀點提供更鮮明的圖像，更有助於我們周延地分析與討論，一切技術都無例外。

五、重論技術與學術傳播關係

前面提過，本文對學術傳播的分析以傳播方式為重點，現在也採取同樣的角度檢視技術與學術傳播之間的互相作用。若非從傳播方式切入這個議題，技術的角色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近年來資訊科技發展的最重要特徵無非是數位化一項。數位化（或電子化）技術徹底改變了傳播的方式，進而改變社會，^[11]在傳播研究上，有時甚至很難以區別數位技術和資訊技術，它們像是銅板的雙面。前述，在學術傳播上，學術出版品一向昂貴，數位（資訊）技術似乎為相關研究者展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而，數位化是萬靈丹嗎？^[12]《學》就數位化在學術傳播上的應用與影響分

[11] 在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及接收者等四個基本元素中，最直接而劇烈受技術改變的只有傳播方式。我們可以用搬家為喻：假設以徒手搬家、以機車搬家、以貨車搬家、乃至以卡車搬家，所欲搬遷的物品（即傳播內容）、搬出和遷入處所（即傳播者及接收者）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改變搬家過程（即傳播方式）的，是搬家工具（即技術）。這也是我必須著重於傳播方式以討論學術傳播與技術的理由。

[12] 學界雖亦有反省的聲音，例如：Hazel Woodward, Fytton Rowland, Cliff McKnight, Jack Meadows and Carolyn Pritchett (1997), 'Electronic journals: myths and realities', OCLC Systems & Services 13 (4): 144-151. 不過大致上還是樂觀迎接美麗新世界的態度居多。

別討論了出版模式（第三章）、同儕評閱（第四章）、開放存取（第七章）及大學出版社（第八章）等主題，若我們能繼續保持生態式思考，則作者對開放存取及大學出版社兩項的分析便相對顯得不夠周全；或者換個說法，近於技術烏托邦觀點。以下是可能的補充。

數位技術方興未艾時，許多樂觀的技術人員、傳播學者、工商界和出版業都相信無紙社會或無紙辦公室即將來臨。^[13] 如果我們沒有忘了紙張也是一種資訊硬體技術，當我們將紙張與現代數位技術對比時，就能發現紙張仍有太多數位技術無法涵蓋的功能。用最簡潔的說法：紙張之為資訊技術，其社會基礎結構（social infrastructure）較之於數位化資訊技術始終更單純、簡易。^[14] 紙張式的資訊產品，其生產過程與閱讀時的硬體條件都不如數位化資訊產品複雜，它只需紙漿、造紙廠、印刷廠，不必晶圓廠、不必讀取設備（電腦或其他機器）、不必閱讀軟體、更不必電源、也不必學習操做不同的閱讀設備。^[15]

同為資訊載體，紙張形式的產品可以「一次擁有」（once-and-for-all），而數位化產品則往往只能「擁有一次」（all-but-for-once）。道理很簡單：求生存是生物的基本目標，在數位技術的社會基礎結構下，技術開發者生存的唯一道路就是不斷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並且不斷為社會製造只有依賴這些新產品和新技術才能滿足的新慾望。你當然可以堅持使用 386 電腦和 Windows 3.0，如果你的電腦可與世隔絕、甚至什麼事都不做。否則，數位產品形同綁架使用者，我們必須不斷被迫升級軟硬體才能順利獲取內容。於是五百年前的書籍如今依然可讀，十五年前的 5.25 英吋磁片卻該如何讀取？這是數位技術的宿命。

再往下看，我們要問：數位化的社會基礎結構為何？除了必要的硬體和軟體，還要有充足的人力，以及執行數位化工作的時間。而且，在實務上所需的人力和時間遠比想像龐大。即使這樣仍然不夠，我們還需要其他條件配合，例如詮釋資料（metadata）的規範即是其一。任何人只要確實進入數位化工作中，相信可

[13] 以無紙辦公室為例，有關此一夢想如何不切實際，可參見 Abigail J. Sellen and Richard H.R. Harper (2001), *The Myth of the Paperless Offi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4] 社會基礎結構（social infrastructure）或可譯為「社會基礎建設」，是生態式思考的延伸，意指為使某一社會活動得以可能的基本社會條件之總和，如前述影印機的例子中，薩哈拉沙漠的社會基礎結構自是無法讓影印機的功能實現。

[15] 如此比較只是為了凸顯紙張在資訊傳播上有其無可替代之處，重點在強調紙張與數位技術的差異而非孰優孰劣。

以更全面羅列其他社會基礎結構條件。這些條件共同說明了：從硬體、軟體、人力到時間，數位化的成本其實非常高，若是再加上長期的軟硬體升級、內容加值等等成本，則更加可觀；而後者卻是一般積極推廣數位化的人容易視而不見的。再者，資料庫因為製作成本高，訂費自然降無可降，而資料庫成長的速度，更是所有圖書館員的噩夢。因此，圖書館訂閱的資料庫也是不停地增增減減之中。

回到本書的主題，不論是開放存取或數位化大學出版社，原始考量無非是求助於新技術以節制成本（主要對象實即資料庫成本），相對因應有限預算不斷被競爭者分食的影響。可是不管經營運作模式如何改變，若是一併計算有形與無形的成本，整體而言終究是相去不遠的，差別只在於成本由誰支付。^[16] 也就是說，開放存取或數位化大學出版社越是以相同的價值目標和營利性數位出版機構競爭，就越逃不開市場法則的支配，最後依舊邁向高價之路。反之，若志在維持低成本，則開放存取或數位化大學出版社終將影響有限而難以實現其理想。

要怎麼收穫必須先那麼栽，有多少目標就需要多大成本，這是技術烏托邦觀點無法察覺的兩難困境，我們姑且稱之「成本不減定律」（principle of conservation of cost）。

六、結 論

本文針對《學》的內容所廣泛涵括的議題進行學術傳播與出版的社會學分析，其終極目的只有一個：圖書館絕對是一個社會文化機構，而相對衍生的圖書資訊學亦不可自絕於社會文化研究觀點的檢視（以及其他諸多學術領域的加入）。過去圖書資訊學界對社會學的興趣，大致止於知識社會學，而社會學能貢獻圖書資訊學的研究成果其實還有更多。當前國際學術思潮發展的趨勢之一，是整合式的研究（integrated study）。本文只是初步的嘗試，期待未來的圖書資訊學能有更多跨領域的研究出現。^[17]

（收到日期：96.4.7）

[16] 雖然我確信事實應是如此，但嚴格說這只是揣想和推論。由於既有資料普遍忽視無形成本（hidden costs），若欲驗證這個推論，有必要另行界定成本計算的對象，然後重新調查各種不同出版模式之異同。

[17] 2007年10月27日世新大學將舉辦「『資訊研究方法論』工作坊」，正式徵求傳播學、社會學、圖書資訊學、資訊科學等角度探討的論文，樂見類似的視野可以在國內圖書資訊學界逐漸拓展。

Book Review:
Jeong-yeou Chiu's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 Publishing

Yuan-peng Huang

Abstract

We live in a technology-embedded society. That is,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if there is one, calls for a closer look a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t what is the better way to do this? Concerning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hich is one field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tudies, to think ecologically helps us, like it does in other places, reach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it. As we already know, a communicating practice contains, at least, four elements, i.e. sender, content, mode, and receiver. In order to show the intervention and consequence of technology in this practice,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is highlighted and thereby I examine the issues raised by the book in review. Foregrounding ecological thinking permanently and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 re-situate these issues carefully in the due context and then identify the limit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 perspective which has been traditionally ignored or taken for grant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t is a book review as well as an exploration of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Moreover, it is aiming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n the subjec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Keywords (關鍵詞) : Book Review ; Jeong-yeou Chiu ;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 Scholarly Publishing ; Journal Publishing ; Modernity ; Ecological Thinking ; Technology 書評 ; 邱炯友 ; 學術傳播 ; 學術出版 ; 期刊出版 ; 現代性 ; 生態式思考 ; 技術

Yuan-peng Huang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

E-mail: y.huang4@lancaster.ac.uk